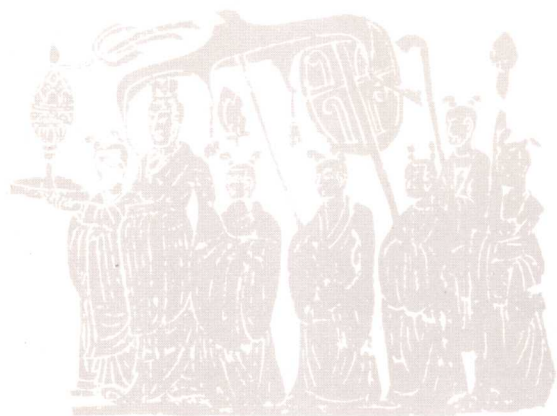


許富宏 撰

鬼谷子集校集注



中華書局

許富宏 撰

鬼谷子集校集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鬼谷子集校集注/許富宏撰. -北京:中華書局,2008.12
ISBN 978 - 7 - 101 - 06352 - 3

I. 鬼… II. 許… III. ①縱橫家②鬼谷子 - 研究
IV. B228.0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60750 號

責任編輯: 聶麗娟

鬼谷子集校集注

許富宏 撰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1/32 · 14 1/4 印張 · 2 插頁 · 300 千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3000 冊 定價: 38.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6352 - 3

序言

《鬼谷子》一書是先秦縱橫家的理論著作，也是對春秋以來行人遊說、諫說的經驗技巧和此類文章寫作經驗與技巧的總結。它不僅在我國論說文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國古代心理學和人際關係、組織管理與策劃等學科的研究上，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自然，中國古代並沒有心理學、人際關係學、管理與策劃學這些學科，談到人際關係，也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來自儒家倫理學說和「禮」學的一套理論，對君對父，都講「死諫」；對兄弟、親朋，只講誠信。但君、父中也有兇暴不聽正確的勸諫者，師友、弟兄、親戚中也有固執不接受有益的建議甚至心胸狹隘、多疑好忌者；儒家重視識人與擇友，但人在社會上也難免要和修養較差甚至品質低劣的人打交道。對這些問題，儒家經典中找不到答案。西漢以來的兩千多年中，一直是儒家思想佔統治地位；作為其補充的，在朝者以法家為用，在野者以道家為旨趣，讀書人少有知經世致用之理者。唐代士人「求知己」和「溫卷」所奉，詩歌之外，便是傳奇小說（參文獻通考選學考），均不關乎世事。儒生只習經書詩賦，不一定能處好社會各方面的關係。不要說一般士子，就是儒家的大聖人孔子，雖然也

說：「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春秋經傳集解第十七）也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語子路）也講「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論語堯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論語衛靈公），但他奔忙于諸侯間數十年，先後罷官于魯，冷遇于衛，拘畏于匡，斥逐于蒲，困厄于陳、蔡，危難于宋、鄭，受阻于晉、楚，真如莊子盜跖所說「不容於天下」，謀求仕進以企推行仁政，而其願望終究未能實現。子路是孔門中以政事而著稱的，也是孔子最忠實的弟子，當他聽到孔子說為政「必先正名」，竟脫口而出地說道：「子之迂也。」（論語子路）孔子的另一個以政事出名的弟子冉求則說：「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論語雍也）由於冉求在任季氏家臣時的一些做法與孔子的意見不合，孔子曾說：「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反映出孔子的理論同當時的社會實踐存在一定的差距。儒家的亞聖孟軻說：「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奔走于鄒、齊、魯、宋、薛、滕、魏等國，高談闊論，意氣風發，力駁雄辯，橫掃千軍。然而將近二十年的遊說，一無成功，所遇君主不是「勃然乎變色」，便是「顧左右而言他」，或者以「吾昏，不能進於是矣」之類的客氣話委婉加以拒絕，甚者，竟毫不遮掩地說：「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使他無法再說下去。孟子說：「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孟子公孫丑下）他和孔子一樣有着消除社會戰亂、維護社會正常秩序、拯救貧苦百姓于水火的歷史責任感和社會使命感，因而

抱着積極的人世態度，但也同樣未能取得成功。這是因爲孔子、孟子都只從社會的政治、道德方面考慮問題，而沒有考慮在中國當時的社會制度下，一個國家的君主和掌權的卿大夫的意願便是這個國家政治行爲的唯一準則，無民主可言，此後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社會一直如此。要達到能參與政治的目的，首先要專權者能聽信你，任用你，接受你的建議或意見。人們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之中求生存、謀發展，必然會有一些經驗與教訓產生，即使沒有人把它寫成書，這些經驗也總會流傳下來，逐步積累，慢慢形成一些理論。鬼谷子這部書就正是這方面經驗與理論的總結，也是先秦時代在這方面進行深入探討的唯一理論著作。

鬼谷子對過去學者們所忽略了的很多現象進行總結、概括，悟出一些道理，總結出一套理論。「捭闔」、「反應」、「內捷」、「抵巇」、「飛箝」、「忤合」、「符言」等都是以前諸子之書未見的概念（虞氏春秋中有揣摩等篇，韓非子中有「揣情」之語，但都是戰國末年人的著作），爲戰國中期以前士人聞所未聞。當然，這部書只能產生在禮崩樂壞、諸侯攻伐、士人奔波於各國之間以言談、計謀取官爵地位的戰國時代，因而其中也留下了深刻的時代烙印。

應該說，鬼谷子中的一些理論，是在春秋以來從政士人的實踐活動中不斷積累形成的。春秋時代的行人在諸侯國之間進行交結、盟會，爲了本國的利益，總要千方百計說動

或壓服對方，不講究寫文章（書信、上書、陳辭、外交辭令等）和說話應對的技巧不行，也不能不瞭解對方國家的基本情況及國君和主政卿大夫的地位、經歷、能力、學問、嗜好、性格等。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說鄭國著名的行人子羽（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這就同孔子、孟子的只考慮自己的政治理想、倫理道德理論等，自說自話，不考慮瞭解遊說國家及其有關人員的具體情況，不考慮其國君、主政卿大夫的真實想法的情形大不相同。當然，這也正是孔子之所以爲孔子，孟子之所以爲孟子的原因。他們的歷史地位是由於他們在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的卓越貢獻，由於他們不凡的人格力量形成的。從社會政治的實踐方面說，他們是失敗者。孔子的學生也有出仕者，如冉求、子貢等，但有的爲卿大夫的家臣，有的也僅僅是一般的行人，還未能進入到政治決策的機構中去，只能是在既成的政治主張和運行框架下發揮一些作用。墨子的時代已經表現出士人在某些諸侯國政治軍事活動中的重要作用，但基本狀況沒有變。雖然這樣，從孔子的某些弟子（如上舉冉求）和墨子來看，一些士人已經意識到在一方面是禮崩樂壞，諸侯、卿大夫專權，另一方面基本上還維持着諸侯、卿大夫世襲地位的社會中，說話的技巧和辦事的方式是很重要的，它往往決定着事情的成敗。荀子子道中有一段文字：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

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路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女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女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這裏表現出子貢不僅會提問題，而且對孔子的思想、爲人有着深刻的瞭解，對孔子心理狀況也有所掌握。因爲他們居於魯國，從禮的方面說，不能非議魯大夫。論語述而中還記了一件事：冉求想瞭解孔子對衛出公與其父蒯聵爭奪王位一事的態度。他沒有直接去問孔子，而對子貢說，由子貢去問。子貢不直接問此事，而問：「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回答說：「古之賢人也。」子貢又問：「怨乎？」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出來後對冉求說：夫子是不讚成衛出公的作法的。子貢爲什麼會作出這樣的判斷呢？因爲伯夷、叔齊二人互讓君位，從孔子讚揚伯夷、叔齊的語氣中就可以知道孔子是不讚成兒子同老子爭王位的。由這些事例可以看出，子貢以言語著稱，而其實不僅在善於言辭，還在於對各方面情況包括對方思想、作風、性格以至心理的瞭解。孔子說：「辭達而已矣。」（論語衛靈公）但要做到這個「達」，只靠能說會道是不行的。正如儀禮聘禮所說：「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孔子曾經說：「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孔叢子嘉言）。他對

巧言令色的人評價很低。可見，孔子的思想中，要提高言語的表達水平，也包括其他相關素質的培養。孔子曾說：「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論語衛靈公）。可見，孔子也是注意觀察人，瞭解與之交際者的有關情況，甚至推度對方的思想、心理的。

儘管孔子的思想與其教育學生的實踐中注重對人的瞭解、識別和對一些人言行用意的推度，但孔子在交際中更注重對人的選擇，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論語衛靈公），而後來之土人考慮的則是如何同各種人打交道。墨子說，時當「世亂」，「今求善者寡。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故主張「雖不扣必鳴」（墨子公孟）。墨子也專門研究論辯、遊說的方法和技巧，至墨家後學，更總結概括出「或」、「假」、「效」、「辟」、「侷」、「援」、「推」諸理論（參墨子小取）。這不僅在古代論說文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在我國語法學、修辭學、邏輯學史上也具有重要意義。應該說，這是由老子、孔子時代，即私學初創時期的聖人作風，向私學發展、土人勢力擴大、土人普遍爭取走上政治舞臺的戰國時代過渡的當中，社會精英思想作風轉變的表現。戰國時期，諸侯們不再是在承認周天子存在的情況下搞「尊王攘夷」的把戲，爭當霸主，而是都希望統一全國。「一天下」成了當時有遠見的政治家的共識，也成了各個諸侯國都希望達到的目標。道家看透了那些諸侯、卿大夫相互爭奪的實質，也看透

了儒家末流借着仁義道德作統治階級幫兇的本質，所以對當時的社會失去了信心。儒家的思孟學派將孔子的思想向心性方面發展，在如何實現其政治理想方面，並沒有拿出有效的辦法。戰國之末的荀況，曾兩至齊國的稷下，接受了法家的某些思想，也受了一些縱橫家的影響，在楚國春申君時代的政治上也還發揮了一點作用。真正認真總結春秋以來行人活動的實踐經驗和戰國初期以來士人參與政治活動的經驗與教訓，對於士人在封建專制制度下如何才能走上政治舞臺，在君主專權的情況下如何才能發揮政治作用，如何在事業上取得成功進行認真探討的著作，是鬼谷子這部書。

鬼谷子實際上是繼承了部分老子、莊子的思想，又總結了包括孔子、子貢、墨子在內一些知識分子遊說從政的經驗教訓，以及孔子之前叔孫豹、晏嬰、子產、叔問、子大叔等人進行外交活動、外事交涉、陳述辭令、勸諫君主等等的經驗的。比如它說的「欲高反下，欲取反與」的理論，就同老子第三十六章說的「將與奪之，必固與之」一致。明楊慎鬼谷子序引鬼谷子中「神之爲長」數句，「心氣一則神不徨」數句，「無爲而求」數句，又引莊子「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等語加以比較，以爲「鬼谷子其有得於是說」。上文所舉子貢向孔子問對衛出公的態度，卻不直接提出衛出公，而問他對伯夷、叔齊的看法，正是用了鬼谷子中所說的「捭闔」、「飛箝」之法，只是當時未提出這些名稱而

已。其摩篇云：「古之善摩者，如操鈎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其揣篇云：「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均明言有取于古人之經驗。權篇云：「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忌諱也；『衆口鑠金』，言有曲故也。」謀篇云：「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均引述古人之語立論。至於其中化用老子、易傳之處，亦復不少。這些都反映出這部書是在總結此前長期積累的社會經驗的基礎上完成的。

鬼谷子一書前人多評價不高，如柳宗元言其「險整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鬼谷子辨）。宋濂云：「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則家亡，國用之則國僨，天下用之則失天下，學士大夫宜唾去不道」（諸子辨）。胡應麟則評其「淺而陋」（四部正偽）。所以正統文人都對其不屑一顧。其實，這部書除了上面所談社會交際方面的應用價值和政治心理學等方面的開拓性研究之外，從哲學的層面上看也有值得稱道之處。可以說，這部書中充滿了辯證法思想。

首先，它認為世界上的事物都存在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僅第一篇捭闔提到對立概念的句子就有「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賢不肖、智愚、勇怯」，「乃可捭、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等等。書中似乎還體現了這樣一種思想：任何國家，任何羣體，任何地方，矛盾總是存在的。抵巇篇說：「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巇

隙，不可不察也。」這實際上也是這本書立論的基礎之一。

其次，它認為事物是變化的，不是一成不變的。《掉闔篇》說：「變化無窮，各有所歸。」《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隱而入。陽還終陰，陰極反陽。》《忤合篇》說：「世無常貴，事無常師。」等等，都反映出這種思想。

再次，它認為事物之間是相互聯繫的，不是孤立的。《鬼谷子》一書的很多理論都是建立在這個認識之上的，不煩舉例。

同時，鬼谷子書中的思想也表現出一定程度上的唯物主義因素。固然，總體上說來，此書以道為「天地之始」，屬於客觀唯心主義，但在具體論述中，特別強調對現實的瞭解，要求人的思想要合乎實際，要求注重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比如飛箝中說：「將欲用之於天下，必度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岨嶮之難易，人民貨財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疏，孰愛孰憎。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揣篇等都反復講這個道理。

鬼谷子書中有很多篇屬於交際和處世方面的理論，基於該書的著述目的，以論如何處理君臣關係的內容為多。如權篇云：「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言，依於辨；與辨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于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

謙；與勇者言，依於敢；與愚者言，依於銳。此其術也，而人常反之。這比卡耐基人性的弱點中的相關理論早兩千多年，在生活中，尤其在專制的封建社會中，不是毫無意義的。再如謀篇云：「其身內，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韓非子說難等篇關於這個道理論之甚詳。這同人們平時所說的「交深言淺」、「交淺言深」利害關係是同一個道理。

公正地說來，鬼谷子一書並非完全是講陰謀詭計、教人壞良心的，其實有些地方與儒、道、法等家的著作相通，如高似孫子略所摘引「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等同儒家思想一致，只是儒、法等注重講目的、講理想、講理論，而鬼谷子一書則重視主客觀的條件，更多地着眼於達到某一目的的方法和途徑。比方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衛靈公）鬼谷子也講成名，它說：「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忤合）。這就是說，關鍵要對客觀實際有全面、準確的把握，根據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的辦法。這就同孔子所稱讚的「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論語公冶長）的做法大不一樣。按照孔子所稱讚的那個辦法，碰到昏暴愚昧之君，便毫無辦法，只有裝傻。鬼谷子抵巇云：

天下紛錯，士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偽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芽蠹罅。聖人見

萌芽蠟罇，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

這種積極入世的思想，似乎更有利於社會的發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真是驚世駭俗的反傳統之論。在先秦諸子中，只有孟子的「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孟子梁惠王下），與之相近，多少體現了一種同封建正統思想相對立的民主精神。在鬼谷子中找不到傳統的「忠君愛國」思想的影子。這也是人們評價縱橫家時常說到的思想缺陷之一。固然，象春秋時楚國的莫敖大心、申包胥、鄭國的弦高、戰國時屈原那樣的愛國精神，我們應該弘揚，但當時的國家畢竟不同於近代國家之概念，他們「愛國」的思想內涵同林則徐、貝青喬等人的畢竟大不相同，所以才有「楚材晉用」的事實。戰國末年的楚國屈原投汨羅而死，屈原則遠走燕國。我們固然特別地稱讚屈原的愛國精神，但也不能對屈原過分苛求；各人的認識不同而已。至於忠君思想，是中國封建文化中最大的糟粕，是應該徹底批判的，古代有的思想家如孟子、黃宗羲等都對它進行批判。所以，我們也不能因此而鄙視鬼谷子一書。

鬼谷子一書中也講德，也講善，講美，也並不排斥「道德、仁義、禮樂、忠信」（內捷），只是它將這些同法、術、勢等同等看待，並不特別地傾向哪一個方面；也同等地利用，不以哪一家為敵而加以摒棄。也就是說，它只是探索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達到一種目的的方法

與途徑。

鬼谷子一書，既是歷史的必然產物，也是應運而生的。劉勰文心雕龍論說云：

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紓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暨戰國爭雄，辨士雲湧，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箝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

既列舉了歷史上幾個著名的因論說技巧之獨特與高超而成功的案例，也指出了戰國時遊說之風的普遍及遊說成功對個人榮枯和當時形勢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劉知幾史通言語亦云：

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爲宗，利口者以寓言爲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橫、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

這是對當時社會風氣和士人心態的準確概括。當時一方面由於士人普遍積極參與各國的政治活動，尤其是參與各國的決策活動，產生了不少成功的經驗，需要總結；另一方面從歷史的發展趨勢上說，將有更多的士人爭取登上政治舞臺，也需要一部全面介紹縱橫家的經驗，對它們進行理論概括的著作。

在先秦諸學中，鬼谷子是一部十分獨特的書。它的特殊之處除了和先秦儒、道、法、名等各家著作一樣，表現了與他家不同的思想、主張之外，主要在於它探討了各家都不涉及的一些方法問題，也涉及到對接受者心理的揣摩和利用。從這一點說，它與戰國中期的墨辯與名家相近。鬼谷子同墨辯、名家在同一時期產生，這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戰國之末產生的韓非子中的難言、揚權、孤憤、說難、和氏、解老、功名等篇，則不僅主旨、內容與鬼谷子相近，思想上也有相通處。都體現了「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鬼谷子中經）的思想。但從總體上來說，韓非子多論君主如何重勢立法以御臣下，而鬼谷子專論士人如何對付各種各樣的君主，專論如何取得君主的信任而成其事。

鬼谷子同先秦的兵家、農家、方技、陰陽一樣，在古代是具有應用價值的著作。拋開歷代儒家學者造成的偏見，在先秦諸子中，它也是獨樹一幟的。縱橫家是先秦諸子中重要的一家，研究先秦諸子而將鬼谷子排除在外，是不應該的。

從鬼谷子同張儀的關係看，鬼谷子其人應是戰國中期人物。史記張儀列傳云：「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爲不及張儀。」張儀卒于秦武王二年，即前三〇九年，較蘇秦年長（史記記載以二人年相若，有誤。上世紀七十年代出土戰國縱橫家書已證明這一點），蘇秦學業初成之時以爲不及張儀，也是自然的。以孔子弟子例之，年齡相差大而同時學於一個老師

門下的情況是有的，先後同門而傳說中誤爲同時就學的可能性也存在。總之，張儀、蘇秦都曾學習於鬼谷子，這點似不應有所懷疑。那麼，鬼谷子應生活於戰國中期。

我以爲鬼谷子這部書不是一時寫成的，應該是在一個較長時間中完成的，其中概括有包括張儀等早期弟子的經驗和理論，也將蘇秦之類較晚的弟子或後學的論著編入其中。劉向戰國策敘錄中說：「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結合出土戰國縱橫家書來看，戰國後期有很多這類彙編的縱橫家書信、上書、諫說稿流傳。有的可能是原件傳抄出來，有的應是所存底稿或追記稿。追記的現象在先秦時代是存在的，孟子一書中的很多篇章就是追記稿。有很多開始原件上並無主名，也無爲什麼寫這篇東西及其效果的說明，傳抄中爲了便於瞭解文意，明白其中有些話的針對性，才在開頭標出主名，加上了有關背景的材料，在其末尾說明事情的結果。這種「穿靴戴帽」的工作有的甚至是到劉向編戰國策的時候才完成的，這一點，將戰國縱橫家書與戰國策相同的篇章進行對照，即可明白。各種說辭、書信等的彙編本，就似明清時代的「墨卷」，在士人中廣泛流傳。由這就可以看出當時的士人對於遊說理論需要的迫切性。鬼谷子一書既是對春秋以來行人實踐活動與辭令寫作經驗的總結，也是對當時士人中流傳的各種做法、經驗、理論和不同形式的辭令、書啟、遊說辭寫作經驗的總結、概括與